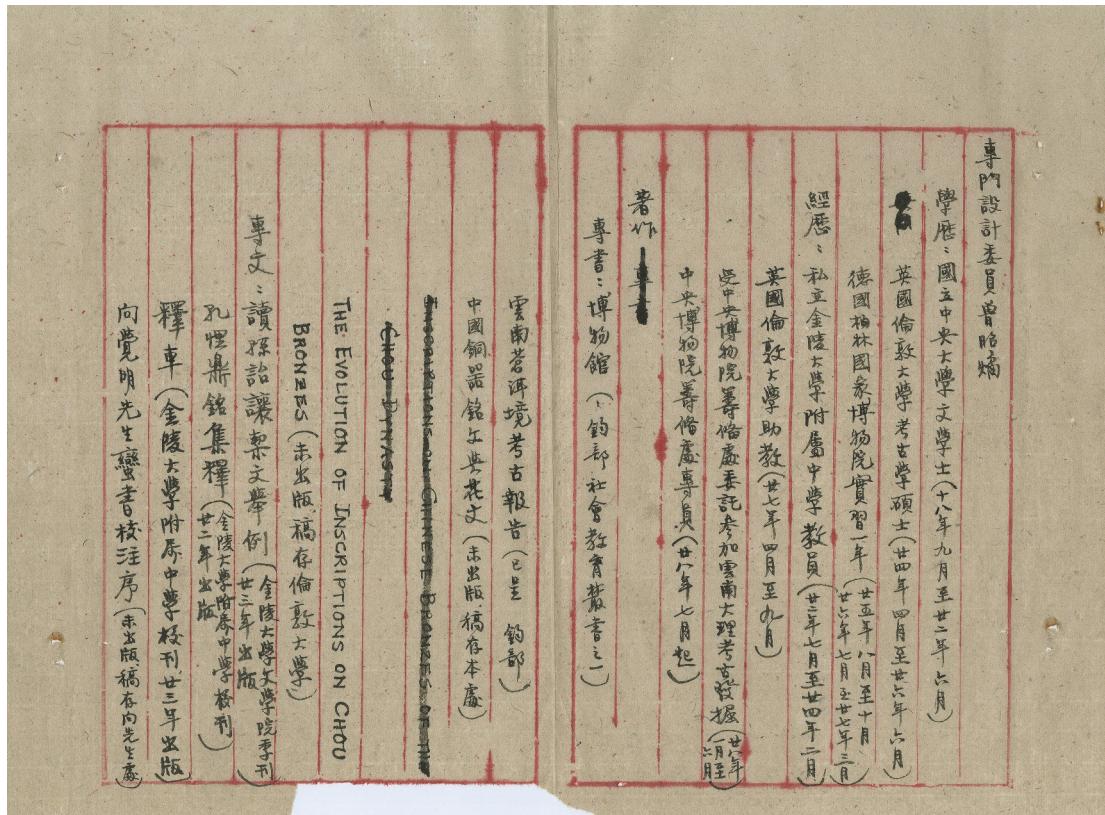


從傳統文史科到新興博物館學： 青年曾昭燏的專業養成與職涯選擇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戴麗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45 期 2025.12

回顧民國時期文史界學人群像，大家耳熟能詳的多是男性學者之名號，在屈指可數的女性學者中，曾昭燏（1909-1964）算是較常被提及的一位。^①她是曾國藩家族後代，職涯最高峰曾擔任南京博物院院長，並在南京大學歷史系兼課講授考古學，因此在1950年代中國考古學界有南霸天的稱號，與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夏鼐（1910-1985）並稱為「南曾北夏」。不過因為她在1964年底自殺身亡，文革時期批鬥風潮令人噤聲，直到1980年代，因政治氛圍變化，其同僚故舊的紀念文章才得以問世。^②1999年，南京博物院主動推出故院長文集，並著手整理其遺稿。2009年，在其誕辰百週年之際，南京博物院不僅推出紀念文集，還以四年時間推出其文集三大冊，將其已發表和未刊文字依不同主題集結成冊，自此相關研究才漸多。^③

不過若仔細看現有研究，會發現多數文章以她已成為專業考古學家或博物館學家的角度來回顧，較少分析她學思歷程的轉折與當時古學領域變化的關係。若我們不能掌握這段學術史的動態變化，其實不易理解為何原本國文系畢業的曾昭燏後來會變成中國博物館學最早的專家之一。事實上，當時古史研究領域已大幅擴增，研究材料不限於傳世文獻，還包括古文字、古器物、新出土古文書、考古發掘物等，所以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這樣涵蓋歷史、古文字、考古部門的機構組織得以出現，而創所所長傅斯年（1896-1950）還曾兼任1933年5月新成立的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以下簡稱中博院籌備處）第一任主任，直到1934年7月因健康

^① 本文最初版本是為參加2024年中舉行之Women Historians around the World, 1860-1960國際會議而寫，感謝主辦人李貞德教授的邀請，以及會中評論人李尚仁教授及其他與會學者的提問。本課題最初進行時，並無特殊經費支持，後筆者所擬計畫「非文字途徑的認知、感知與知識形塑：以晚清民國時期興起的博物館、實地調查、考古發掘為主線的研究」獲中央研究院深耕計畫（AS-IV-114-H04）獎助，得以出國補充部分資料，感謝深耕計畫的支持。收集資料期間，蒙傅斯年圖書館、史語所檔案館、檔案管理局、英國Dorset Museum & Art Gallery工作人員協助；研究期間，曾獲張義君、鄧涵云、林易陞、林盈君等助理協助，在此一併致謝。論文出版最後階段，幸有期刊編輯吳瑞芬小姐、丁瑞茂先生專業校對補正，使本文得以避免諸多脫誤，容我於此再表謝忱。

^② 例如其舊屬趙青芳在1981年開始發表一篇回憶文在《文博通訊》，後又陸續在不同時機撰寫相關紀念文刊登在不同刊物，這些文章皆收入南京博物院編，《趙青芳文集·考古日記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192-205。

^③ 南京博物院與曾昭燏相關的出版品：南京博物院編，《曾昭燏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南京博物院編，《曾昭燏紀念》（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南京博物院編，《曾昭燏文集·考古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南京博物院編，《曾昭燏文集·博物館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南京博物院編，《曾昭燏文集·日記書信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某些紀念文章已收入這些文集中，於此不一一列舉。以她為主題的晚近研究不少，舉要如下：李又寧，〈曾昭燏（1909-1964）——我國最傑出的女性考古學家及博物館學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1993）：35-48；張蔚星，〈南京博物院藏曾昭燏師友書札考略（上）〉，《收藏家》2010.1：21-28；楊靖華，〈吉金貞石——曾昭燏和曾紹杰姐弟〉，《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14.4：36-43；崔小英，〈曾昭燏：奠基中國文博事業的傳奇人物〉，《美術觀察》2021.12：58-61。另有幾份外文著作曾提到她：Wang Tao and Peter Ucko, “Early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Practice and Syllabuses in China and England,” in *From Concepts of the Past to Practical Strategies: The Teaching of Archaeological Field Techniques*, ed. Peter Ucko, Qin Ling, and Jane Hubert (London: Saffron Books, 2007), pp. 45-76; Anke Hein, Jade d'Alpoim Guedes, Kuei-chen Lin, and Mingyu Teng, “Female scholar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archaeology,” in *Women in archaeology: Intersectionalities in Practice Worldwide*, ed. S. L. López Varela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3), pp. 559-590; Shana J. Brown, “China's 'First' Female Archaeologists: Rong Yuan, Zhou Yingxue, Zeng Zhaoyu, and Zheng Zhenxiang,” in *Women Across Asian Art: Selected Essays in Art & Material Culture*, ed. Lu Ling-en and Allysa B. Peyto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2023), pp. 121-153.

不佳而辭任。之後則由史語所考古組主任李濟（1896-1979）兼任此職，直至 1947 年 5 月。可見中博院籌備處早期發展與史語所有密切關係，而曾昭燏在 1938 年末自國外留學返華的第一份工作正是在中博院籌備處，由此角度切入，可觀察其尋求專業養成過程中的某些變化。

以青年曾昭燏的學思歷程來看，可看出她其實經歷了從古典文史詩詞到古文字學、金石學，再轉到新興田野考古學和博物館學的過程。同時，也因為她身處菁英階層的家族背景和社會網絡，而有機會赴英國留學、到德國實習，甚至因英國導師的賞識而獲得在倫敦大學工作的經驗，最後又選擇回到戰亂中國，在傅斯年與李濟網羅人才的背景下進入中博院籌備處開始其職業生涯。在受高教女性相對稀少的年代，曾昭燏的經歷除了她個人的極度努力、家人的實質支持外，也反映了那個學術轉型時代，青年學子可能有的專業選擇，已與前代大不相同。在這個部分，由於曾昭燏在 1950 年代反右運動中將其早年資料毀去大半，故南京博物院出版品提供的資訊並不完整，甚至有部分時序錯置，反倒是以史語所的史語所檔案、傅斯年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存中博院籌備處早期資料等，可能幫助我們將這部分的學術史進一步脈絡化。由於配合專號出版，寫作時間有限，本文算是往此方向的初步嘗試，文中未盡之處，只能留待未來繼續努力。

依照曾昭燏青年時期的學經歷發展和轉折，本文分為五節陳述：第一節描述其出生到赴英留學前的興趣和古學養成；第二節說明她在英國留學期間與傅斯年、李濟的互動，以及她決定增加與博物館學相關訓練的過程；第三節分析她與碩士指導老師葉慈（Walter Perceval Yetts, 1878-1957）的互動以及後來的合作；④第四節簡述她回到中國後的第一份工作之內容，也就是她在中博院籌備處的經歷；第五節則聚焦於她的博物館學專著與同時期同類作品比較，探討其特色與奠基性。全文大致以 1949 年為斷限，其時曾昭燏正好四十歲，之後十多年的變化因受政治環境影響較大，已不在本文主題討論範圍，僅於結論略述。

一、曾昭燏早年生平和學術興趣

曾昭燏（1909.1.29-1964.12.22），⑤中國湖南湘鄉人，是晚清名臣曾國藩（1811-1892）的弟弟曾國潢（1820-1886）之曾孫女。她的父親曾廣祚（1879-1931）、母親陳

④ 葉慈的原名寫法，應該是 Walter Perceval Yetts，但不管是當年或後世文章，部分作者將其誤植為 Walter Percival Yetts，因此造成混淆。

⑤ 此處特別標出曾氏的生日，是因為現有研究提供的日期不同，例如曹清、張蔚星編撰，《曾昭燏年譜（徵求意見稿）》（南京：南京博物院，2009），提供的日期是 2 月 3 日，維基百科相關詞條提供日期為 1 月 27 日。造成這些差異的部分原因有可能是農曆和西曆換算有誤造成。本文按照南京博物院出版品提供的農曆日期（清宣統元年正月初八），再使用中央研究院兩千年中西曆轉換系統換算成西曆所得，不確定是否無誤，僅提供讀者參考。

光璐（1878-1939）共生育十二個子女，但真正長大成人者共七人。^⑥在七位手足中，曾昭燏排行第三，上有兩位兄長，原本在她之前還有一位姊姊，但這位姊姊在剛進入中學不久便因傷寒早夭，曾昭燏因此成為手足中女性最長者，似乎也因此養成長姊風範。^⑦在曾昭燏這代，曾家在經濟方面已大不如前，但父母仍十分注重子女的教育。和家族其他孩童一樣，她在六歲左右就開始隨姊姊在家塾讀書，學習十三經、背誦古文詩詞、練習書法等等。十四歲入長沙藝芳女校上中學。該校是一所由華人基督徒建立和管理的學校，完全沒有外國教會的涉入，雖有基督教色彩，但辦學理念和風格是中西融通。該校校長和教務主任是曾昭燏的堂三姐曾寶蓀（1893-1978）和另一房堂二哥曾約農（1893-1986）。這兩位都是自英國留學返華、自願投入經營家鄉的菁英份子。此校受到曾氏家族的贊助，因此家族中不少成員將女兒送到該校就學。曾寶蓀本人是當時有名的教育家，她在 1916 年取得倫敦大學理科學士學位，據說是中國女子第一位在外國取得理科學士學位的人。她終身未嫁，全心投入教育事業。曾昭燏在藝芳女校度過六年中學時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堂姐兼校長的影響，後來也終身未婚，專心投入工作。

1929 年，曾昭燏考入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後因聽同校國文系胡小石先生（1888-1962）的演講而深得啟發，大學第二年便轉到國文系就讀。^⑧ 1931 年，她與同學游壽（1906-1994）、張隆延（1909-2009）^⑨ 正式行跪拜禮，遞門生帖，成為胡老師的入室弟子。^⑩ 她後來成為胡老師十分喜愛與信任的弟子，師生之間的情誼一直維繫到胡師過世為止。曾昭燏入大學後，原本與在中央大學化學系任教的二哥曾昭掄一家同住，但一年後曾昭掄轉任北京大學，剩下三年，曾昭燏就住在胡老師家中，交情深厚可見一斑。

（圖一）

胡小石是曾昭燏在大學的啟蒙老師，他在當時被認為是一位承先啟後、貫通新舊學的博學者，據說他對於古文字、聲韻、訓詁、諸子百家、佛道經典、金石、詞賦、詩歌、戲曲、書法無所不通。他師從中國現代高等師範教育的開拓者、兩江師範學堂監督李瑞清（1867-1920），又受沈曾植（1850-1922）這類的樸學大師提點，等於繼承滿清遺老一輩的學術精髓，又投入新式大學的教育工作。胡小石一生在多個大學任教，啟迪不少青年學子，但由於他專注於教育，個人出版著述不多，故後世相關研究少。此情況晚

^⑥ 七人排行依序為：曾昭承（1897-1979）、曾昭掄（1899-1967）、曾昭燏（1909-1964）、曾昭掤（後名紹杰，1911-1988）、曾昭懿（1913-1969）、曾昭鑄（1918-1998）、曾昭楣（1920-？）。有關曾家輩份排序，此處參考湖南省圖書館編，《大界曾氏五修族譜》（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卷一三，頁 147-148, 150-151, 167-175。

^⑦ 見其最小妹妹曾昭楣之回憶文：曾昭楣，〈憶亡姊昭燏〉，收入南京博物院編，《曾昭燏紀念》，頁 435。曾昭燏有工作收入後，曾資助這位幼妹的學費。也在有獨立固定住處後，把另一位也是單身的妹妹曾昭懿接來同住。1949 年後，長兄曾昭承移居臺灣，她成為長兄之長子曾憲洛（1929-1966）一家最親近的長輩。曾憲洛之長子曾寧因此成為曾昭燏遺物的保管人，為南京博物院有關曾昭燏的出版品提供不少資料。

^⑧ 國立中央大學位於南京，1927 年由國立東南大學改稱而來，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並稱為民國五大名校。

^⑨ 張隆延後來成為書法名家，並留下若干對曾昭燏的回憶。

^⑩ 崔小英，〈曾昭燏：奠基中國文博事業的傳奇人物〉，頁 59。



圖一：中國科學社 1929 年年會大合照，曾昭燏（前排右四）與俞大綱（前排右五）隨曾昭掄前往北平參加
(引自：《科學》14.3〔1929〕)

近稍有改變，但多數討論集中在其書法造詣。¹¹ 曾昭燏曾經把老師講課的題目〈古文變遷論〉內容抄錄整理，以老師之名刊登於中央大學出版的《文藝叢刊》，從中可看出當時他們與胡師學習的部分內容。¹² 當時胡小石主要講授甲骨文和金文，並提醒學生觀察銅器上文字和花紋的變遷，主張應將兩者做綜合的研究。從後來曾昭燏在英國完成的碩士論文來看，可見到她在這方面受到胡師的啟發（詳後）。

1933 年，她曾寫就〈甲骨文字學史略〉一文，刊登於《藝芳雜誌》。¹³ 她認為甲骨文研究在各個階段和面向有標誌性人物：「使甲骨文見重於世者，劉鐵雲也。開研究之始者，孫仲容也。集文字之大成者，羅叔蘊也。進而推古史者，王靜庵也。啓研究形式辭例之端者，吾胡先生也。擴大而為考古學，則中央研究院諸君子也。」對胡師在甲骨文研究發展中的貢獻，有清楚的定位。¹⁴ 在古文字研究外，她也曾發表過多篇古典詩詞，其詩藝才情受到同儕肯定。¹⁵ 另外也曾試作英詩翻譯，在藝芳女校的刊物發表。中國學問外，她也積極學習外語，從其修課成績表來看，可看到她從大一就

¹¹ 晚近關於胡小石的研究，可見：張蔚星，〈納碑入帖 別開生面：南京博物院藏胡小石手札考辨〉，《榮寶齋》2015.10：72-89；郭薇，〈胡小石詩歌中的交游圖〉，《古典文獻研究》第 22 輯上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頁 305-318；程章燦，〈作為詩人和文學史家的胡小石先生〉，《中國文學研究》2020.1：22-29；張守濤，〈胡小石：中國傳統文人的現代典範〉，《同舟共進》2021.2：27-31；趙曉嬌，〈從胡小石著述探析其書學思想的形成〉，《書法》2023.5：82-88。

¹² 胡光煒講，曾昭燏錄，〈古文變遷論〉，《國立中央大學文藝叢刊》1.1（1933）：5-33。

¹³ 曾昭燏，〈甲骨文字學史略〉，《藝芳雜誌》（1933 年 6 月）：55-58。《藝芳雜誌》在出版時，曾一度被出版社誤植為《藝芳季刊》，但其名稱實為《藝芳雜誌》，是一份不定期出版之刊物。

¹⁴ 曾昭燏，〈甲骨文字學史略〉，頁 58。

¹⁵ 其部分詩詞作品已收入南京博物院編，《曾昭燏文集》，頁 314-322。

學習德文、大三開始學習法文等。¹⁶可見大學時期的曾昭燏已養成深厚的古學基礎，對當時古學的新發展有一定的掌握，但也不忘積極學習外語，培養多元的興趣。

1933年夏，她獲文學士學位，不久即受聘於金陵大學附屬中學任國文教師。1934年8月，她又考入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學習，也是師從胡小石，此時胡師課程以中國書法史為主。這段時間，她曾寫就〈讀《契文舉例》〉一文，後刊登於1936年的《小學研究》，從中可見她當時對孫詒讓（1848-1908）這份中國甲骨文基礎研究的掌握，以及她本身對甲骨文所下的工夫。¹⁷

此時她在國學領域已有相當好的底子，若在金大繼續修業，必可順利取得碩士學位。不過就在1934年秋，其表姊兼二嫂俞大綱（1905-1966）考上公費赴牛津大學深造，寫信建議她也到英國留學。¹⁸此議得到她兩位有留美經驗的兄長之大力支持，因此她決定休學，在1935年3月啟程赴英。在她之外，另外一位表姊俞大縝（1904-1988），因為妹妹俞大綱自公費內節省支出，把省下的錢支持她也赴英留學，因此也在1935年11月初到達英國，三姊妹因此可互相照應。¹⁹至於曾昭燏的留學費用，因決定匆促而未能申考公費，一開始是由家中供應，第二年則由在北京大學化學系任教的二哥曾昭掄（即俞大綱之夫）資助，再之後便必須自行籌措。²⁰

赴英後的曾昭燏雖與親人有所照應，但兩位表姊選擇以英語教學和英語翻譯為專長，並在牛津求學，曾昭燏卻因自己的興趣不同，在旁聽一些課程後，受到其中一位教授葉慈的鼓勵，而選擇進入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內的科陶德藝術學院（The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師從葉慈。該藝術學院是1932年才剛成立的學術機構，主要發展藝術史，行政上獨立作業，但附屬於倫敦大學，學生可旁聽大學內其他學院的課程，畢業可取得倫大文憑。

¹⁶ 見曹清、張蔚星編撰，《曾昭燏年譜（徵求意見稿）》，頁23-27。這兩位編者根據曾寧提供、曾昭燏保存的「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學生歷年成績表」，逐年列出她在大學四年間所修習的課程。歸納起來，大一修習課程有：英文名著選讀、英文作文、初級德文、文字學、國學概論、定性分析、唐宋詞選、黨義、普通體育等。大二有：目錄學、中文修辭學、文學史綱要、甲骨文、中國文化史、英文作文、哲學概論、論理學、社會學史、唐人小說、普通體育等。大三有：文學研究法、屈原賦、鐘鼎文、詞學通論、北詞譜、夢窗詞、唐詩、中國外交史、初級法文、普通體育。大四有：練習作文、書經舉要、音韻學、唐以後文學、鐘鼎釋文名著選、南詞譜、毛詩、漢書、陶謝詩、南北詞簡譜、宋名家詞、普通體育等。

¹⁷ 曾昭燏，〈讀《契文舉例》〉，《小學研究》（南京：金陵大學文學院國學研究班，1936），頁169-172。

¹⁸ 俞大綱為俞明頤（1873?-1938，關於其生辰年，有一說為1868年）、曾廣珊（1871-1949）之女，俞大維（1897-1993）之妹。曾廣珊為曾昭燏父親曾廣祚之姊，因此兩家子女是姑舅表親關係。俞大綱在1927年就嫁給曾昭燏的二哥曾昭掄，因此與曾昭燏是表姊妹加姑嫂的關係，親上加親，許多事會互相商量。根據夏鼐日記所載（1935年1月26日日記），他聽聞夏翼天（清華大學外文系第三屆畢業生）的說法，俞大綱原本是前一年第一屆西洋文學公費考試就赴考且得高分，但因分數計算錯誤而失去出國機會，變成是再考後1934年秋才赴英。見夏鼐，《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卷一，頁289。

¹⁹ 俞大縝1935年8月7日搭船赴英，正好與夏鼐同船，傅斯年因此曾請夏鼐在旅途中多關照俞大縝。見夏鼐，《夏鼐日記》卷一，頁344。但俞大縝後半段途中似乎另赴他處，故於同年11月初才到達英國。有關俞大縝，另可見其女兒的回憶文：彭鴻遠，〈我的母親俞大縝〉，收入《老北大宿舍紀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135-147。

²⁰ 二哥留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化學博士。回國後先在中央大學化學系任教，後轉至北京大學。其生平細節，可見戴美政，《曾昭掄評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0）。

二、與傅斯年、李濟的互動

曾昭燏在入學沒多久便意識到，她師從葉慈，其實能從老師身上學到的不多，反而是她在中國古學累積的知識可能可以幫助老師。在她前後期到達、也掛在葉慈名下的學生吳金鼎（1901-1948）和夏鼐也和她有一樣的觀察。吳金鼎是李濟在清華大學的學生，因在1928年發現山東城子崖遺址，初步確定黑陶文化，可與瑞典學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所提出的彩陶文化做比較，因此受到傅斯年和李濟的賞識，兩人為他爭取公費留學的機會，李濟並為他寫推薦函給葉慈，他於1934年8月18日抵倫敦展開留學生涯。²¹曾昭燏到達倫敦時，吳金鼎正好回中國找研究材料，所以曾昭燏在入學前未及請教他。夏鼐則是比曾昭燏晚半年左右到達倫敦，初到時得到曾昭燏不少協助，兩人也有較多機會討論學校的事情。夏鼐也是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原本想念商學，但因想獲得公費留學深造，在李濟的鼓勵下轉學考古，先到殷墟遺址實習，最後也取得公費到英國留學。他也因李濟的推薦，登記於葉慈名下。但因為發現在葉慈處可學不多，幾經考量後，決定轉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考古研究所，學習埃及考古學。²²夏鼐在是否轉校和轉科的猶豫過程中曾寫信請教李濟，李濟原本都將學生推薦到葉慈處，此時因為夏鼐的反應，自認為自己留美的背景，可能不夠瞭解英國的情況，因此與有英國留學經驗的傅斯年商量。傅斯年因此寫信給夏鼐，支持夏鼐重新思考學習方向，甚至認為只要習得專長，有沒有拿到學位並不重要。傅斯年在信中也提及曾昭燏，表示願意與曾昭燏聯繫。²³曾得知後，先向夏鼐借傅斯年的信來看，之後又和惠勒教授（Robert Eric Mortimer Wheeler, 1890-1976）討論，才在1936年6月19日發信給傅斯年，討論自己可能發展的專業方向。²⁴傅斯年在1934年8月與曾昭燏另一表姊俞大綵（1907-1990，即俞大績、俞大綱之妹）結婚後，算是曾昭燏的姑表姊夫，兩人有姻親關係，但在學術上尚未有聯繫，此信可能是兩人初次就學術問題接觸。目前我們在史語所傅斯年檔案中可找到三封曾昭燏在這段時期寄給傅斯年的信，日期分別是1936年6月19日、1936年9月30日、1937年2月8日。²⁵以下就這些信件內容分析當時曾昭燏的考量。（圖二）

在初次的信中，曾昭燏清楚說明自己對於在英國的學習方向產生疑慮，她雖對中國考古學有興趣，但一年多留學的經驗下來，也瞭解到國外「應當學外國的東西」、「中國考古是無從學」。由於傅斯年在給夏鼐的信中寫到，中國考古學之發達須有史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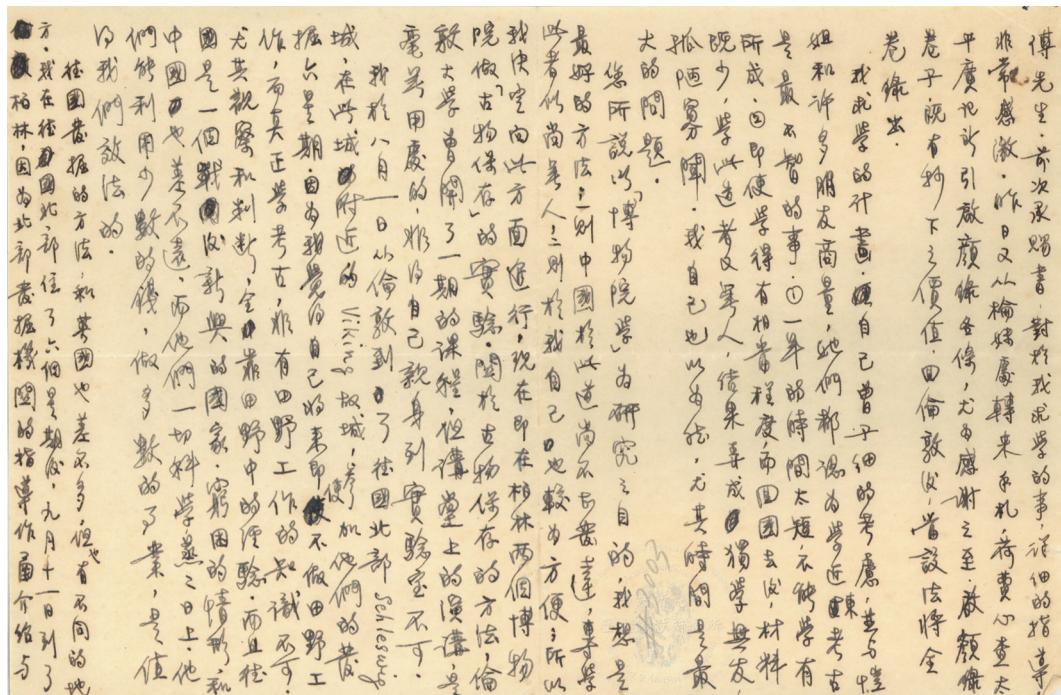
²¹ 吳金鼎抵英日期，可見史語所檔案：考 12-5-5，吳金鼎致傅斯年、李濟函。

²² 此時期夏鼐與李濟之互動，可見劉文鎮、博思源，〈夏鼐與李濟〉，《古今論衡》20（2009）：61-74。

²³ 傅斯年於1936年5月8日給夏鼐的信，已收入夏鼐，《夏鼐書信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頁22-23。

²⁴ 見夏鼐，《夏鼐日記》卷二，頁49。

²⁵ 信件檔號：傅斯年檔案 II 460-1、460-2、460-3。三封信全文內容轉錄打字稿，見本文附件一～三。



圖二：曾昭燦致傅斯年函（1936年9月30日）
(史語所傅斯年檔案 II 460-2)

學、埃及學、亞述學、古典考古學、拜占庭和阿拉伯考古學、印度考古學、大洋洲考古學、美洲考古學等方面的研習，曾昭燦一一分析這些領域在英國的狀況，並認為倫敦大學內發展最好的還是埃及學和「近東的考古」，如美索不達米亞、伊斯蘭等。她原本想轉攻埃及學，也已和相關教授詢問可能性且受到肯定的回應，但因為當時夏鼐已經決定轉攻埃及學，她認為沒有必要兩人都學一樣的。因此在夏鼐的建議下，有考慮選擇學習與「近東」有關的一種，並且聚焦於她比較擅長的「文字」和「歷史」，而排除與「測量」、「製圖」、「地質」、「人類學」較有關的項目。不過這樣的選擇又受到其親友如俞大綱的反對，怕她進入過於冷門的領域，獨學而無友。在這些學業方向的考量外，也有經濟考量：若沒有取得獎學金，她在國外的時間僅剩一年。因此她祈請傅斯年：「希望您為我個人著想，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著想，我學什麼東西最有用處，趕快回信給我，因為我在暑期中必須決定下期的計畫」。

傅斯年給她的回信似乎沒有保存下來，不過我們從曾昭燦1936年9月30日回覆給傅斯年的信可知，在傅斯年提供的幾項建議中，她已決定朝向「博物院學」發展。當時她的看法是：「一則中國於此道尚不太發達，專學此者似尚無人，二則於我自己也較為方便；所以我決定向此方面進行，現在即在柏林兩個博物院做『古物保存』的實驗。關於古物保存的方法，倫敦大學會開了一期的課程，但講堂上的演講，是毫無用處的，非得自己親身到實驗室不可。」而且因為有了英國和德國實習經驗的比較，

曾昭燏認為德國能在戰後貧困的環境下仍發展各項科學事業，是同樣經濟困難的中國可以效法的。從此封信可看出她已萌生在德國進一步深入學習的念頭。在這封信，她也點出田野考古經驗的重要性，她並未忽略考古遺址實習的機會。

此處必須說明的是，到英國留學前的曾昭燏已對考古學有興趣，但她所從事的仍屬於中國傳統金石學、古器物學、古文字學方面的研究，算是「室內考古學」。因意識到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她在倫敦大學正式註冊後，就在葉慈的介紹下，於 1935 年 10 月，至惠勒主持的知名考古遺址「梅登堡」（Maiden Castle）進行實地考古工作三週。²⁶當時惠勒是倫敦大學學院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兼倫敦博物館館長，他自 1934 至 1937 年間率領近百位助手在梅登堡發掘，得到重要的成果。²⁷他也利用此遺址來訓練考古所的學生，讓他們有實際的田野考古經驗。²⁸（圖三）



圖三：英國梅登堡考古遺址工作人員團體照，曾昭燏在前排左一
(The Dorset Natural History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 Archives)

從曾昭燏給傅斯年的這封信來看，1936 年 8 月初，她另有機會到德國北部史勒思維格（Schleswig）一地參與維京人遺址考古六週，之後才到柏林史前史和原史博物館（Museum für Vor- und Frühgeschichte）和國家博物院實驗部實習六週，學習古物修復和保存的方法。²⁹她在 9 月 30 日給傅斯年的回信時，正好是在德國期間，因此詳述了她對德國博物館和田野工作的觀察。

²⁶ 見曹清、張蔚星編撰，《曾昭燏年譜（徵求意見稿）》，頁 29。曾昭燏在給曾約農的信中提到此次在梅登堡參與田野發掘的事。

²⁷ 後世研究者認為此大規模發掘在英國考古史上的意義有二：一方面，其成果替當時的鐵器時代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學術基礎；另一方面，此挖掘也首次揭示此丘堡內部的結構面貌。更重要的是，這項考古活動使惠勒的挖掘方法廣為人知，尤其他所運用的網格系統（box grid），成為日後處理複雜遺址時普遍應用的技術。見 Niall Sharples, “Aspiring to greatness: The recent excavations at Maiden Castle,” in *Great excavations: shaping the archaeological profession*, ed. John Schofield (Oxford: Oxbow Books, 2011), p. 58。

²⁸ 在曾昭燏之後，夏鼐則是在 1936 年 7 月 27 日去梅登堡遺址實習，直到 9 月 5 日。其在當地工作細節可見夏鼐，《夏鼐日記》卷二，頁 57-68。

²⁹ 許多文章根據 1999 年出版的《曾昭燏文集》，說她自 1937 年 3 月到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參加為期十個月的 Schleswig 考古挖掘，此條資訊實有誤。見南京博物院編，《曾昭燏文集》，頁 349。

在 1937 年 2 月 8 日的信件中，曾昭燏更確認到德國繼續學習的想法。一方面她認為德國生活消費較低，負擔可以較輕；另一方面，她認為德國博物院的陳列方法等等，較英國為佳，更值得學習。尤其她從德國返英後，曾在大英博物院（British Museum）做實驗，感覺失望，因此更堅定她後續到德國學習的想法。她也趁李濟受邀到英國演講的期間，當面和李濟討論此事，得到李濟的支持。剩下的便是可否取得獎學金一事，這方面她也衡量了各種辦法，尤其是葉慈可能為她爭取全職助理補助一事，她也評估其利弊得失，結論是：若「能在中國得獎學金，還是在中國得的好，因為比較可以自由。」若是用了葉慈的錢，「勢必非將大部分的時間給人家不可，結果恐怕自己所學無幾」。

就是在這樣的信件往返過程中，傅斯年更瞭解曾昭燏的學思心得，也產生了一些規劃，並曾就相關議題與李濟商量。如前所述，李濟當時不僅在史語所考古組擔任組主任，自 1934 年 7 月開始，也兼任中博院籌備處主任，清楚意識到相關人才之不足。在 1935 年一封為夏鼐寫給清大的信中，李濟就已清楚表示，考古人才應有下列三種訓練：「(一) 田野考古之技術；(二) 博物院保存古物之方法；(三) 比較及鑑定古物之能力」。³⁰所以李濟認為考古人才也應該學習古物保存方法和培養鑑定能力。

由於中國殷墟發掘成果逐步受到國際考古學界注目，1937 年上半年（一月到六月間），李濟受邀赴英國十多所學術機構演講，期間也受邀到瑞典晉見皇太子，並與安特生見面，另又自行安排到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地參觀博物館。³¹在李濟訪英期間，留學當地的吳金鼎、夏鼐和曾昭燏等人都有機會和李濟問學，李濟也因此對曾昭燏的學習情況有更多瞭解。根據李濟在瑞典旅程中寫給傅斯年的一封信（可能於 1937 年 4 月 9 日寄出），李濟答應以一年為限，從中博院籌備處經費提供獎助一年 1500 元，讓曾昭燏到德國學「博物院陳列及保管古物方法」，一年後回國服務。³²（圖四）

1937 年 7 月，曾昭燏在英國順利取得學位，之後不久的確開始在德國柏林實習。據曾昭燏目前殘存的日記記載，她在 1937 年 11 月 7 日收到中博院籌備處寄來的 9 月份津貼，可見最遲於 1937 年 9 月，她已開始獲中博院補助。從日記來看，她在德國期間也已經開始為中博院籌備處購買相關書籍，可推知她此時已與中博院有來往。

不過就在她於德國實習期間，1937 年 12 月 19 日，她就收到英國老師葉慈一信，商討次年春返回英國之事。1938 年 2 月 5 日，她收到葉慈確定聘她為助教的信函，她回信答應，並於德國實習完畢後，4 月 19 日開始在倫敦大學為葉慈工作，並協助教學，曾以中國金石學為主題，教授六堂課。

³⁰ 見史語所檔案：元 545-3。

³¹ 李濟受邀赴英演講一事，原本是更早就接到邀請，但因故推辭延後，直到 1936 年底才出發，故於 1937 年上半年在歐洲各地參訪。目前許多出版品都誤植其英國行為 1936 年上半年，故產生不少時序上的錯誤。其推延赴英一事，可見史語所檔案：考 2-86。

³² 見傅斯年檔案 III 1397。



圖四：李濟致傅斯年函，同意補助曾昭燏一年
(史語所傅斯年檔案 III 1397)

三、與葉慈的互動及後續發展

在討論曾昭燏後續發展前，我們必須瞭解當時葉慈在英國漢學界的地位，才不至於因受到現今易得資料（如晚近出版的夏鼐日記和書信集）的影響，而輕忽葉慈的成就。事實上，葉慈在當時西洋漢學圈頗負盛名，被認為是中國美術考古的專家。他早年習醫，曾赴日內瓦學習，於 1903 年進入英國皇家海軍醫療部門（Royal Navy Medical Service）服務，並在 1906 年隨軍艦薊花號（Thistle）前往中國，在長江一帶航行，至此開啟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³³ 1912 年，他因結婚的關係，申請從皇家海軍退休，並於 1913 年開始擔任英國駐北京公使館的醫官，也因此得以延續他對中國藝術的接觸。不過第一次大戰爆發後，他自願回到皇家軍隊醫療部門服務。戰後他成為英國衛福部醫療官員，從此長期在英國發展。

³³ S. Howard Hansford, “Obituary, Walter Perceval Yett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58): 110.

他本身和妻子都擅長水彩畫，也收集不少中國文物，後來他對中國文化和藝術從喜好變成一種專業。他在 1910 年便加入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從 1916 年起長期擔任該學會的議事與出版委員會成員。³⁴ 他在中國藝術領域最早被注意到的作品，可能是 1912 年在倫敦的中國學會（The China Society）演講後，出版成單行本的《中國藝術的象徵主義》（*Symbolism in Chinese art*）一書，此書雖是僅 28 頁的薄冊，但可看出他對中國古文的掌握，以及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常用的象徵符號之研究。³⁵

返回英國後，他陸續於 1919 至 1922 年在《新中國評論》（*The New China Review*）刊載數篇文章。³⁶ 1921 年開始，他也在指標性的藝術領域刊物《伯靈頓雜誌》（*The Burlington Magazine*）發表多篇與亞洲藝術有關的文章和書評。當時英國對中國藝術品的興趣還集中在瓷器和書畫，陶瓷也吸引較多人的研究，但葉慈已開始對青銅器下更多功夫。1925 年，《伯靈頓雜誌》的元老之一弗瑞（Roger Fry, 1866-1934）集結一批研究者，發表《中國藝術》（*Chinese Art*）一論文集，葉慈就被邀請撰寫有關中國早期青銅器的一章，可見其在青銅器方面的研究已受到同儕肯定。³⁷ 此論文集是《伯靈頓雜誌》出版的專著第一號，受到許多矚目，後來曾更新再版，在英國的中國藝術研究出版史上有其指標性地位。³⁸

也是在 1925 年，葉慈被推選為東方陶瓷學會（Oriental Ceramic Society）的成員。這個學會創立於 1921 年，旨在促進當地中國藝術收藏家之間的交流，算是代表了英國的中國陶瓷研究從二十世紀初持續發展以來，一個新的指標性機構。其創立背景與中國陶瓷收藏家溫克沃夫（Stephen D. Winkworth, 1865-1938）有關，他在 1921 年於自家聚集同好，倡議創辦一個專家間的小型學會以討論最新陶瓷藏品，此舉促成東方陶瓷學會的建立。此學會創始成員人數雖僅十餘人，但都是該領域重要人物，包括希臘裔收藏家尤摩福波羅士（George Eumorfopoulos, 1863-1939）、另一收藏家拉斐爾（Oscar Raphael, 1874-1941）、大英博物館陶瓷部門負責人霍蒲森（Robert L. Hobson, 1872-1941）、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陶瓷部

³⁴ S. Howard Hansford, “Obituary, Walter Perceval Yetts,” p. 112.

³⁵ Sarah Wong and Stacey Pierson, ed., *Collectors, Curators, Connoisseurs: A Century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21-2021* (Londo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2021), p. 321.

³⁶ “Taoist Tales,” *The New China Review* 1.1 (1919): 11-18; “Taoist Tales, Part II,” *The New China Review* 1.2 (1919): 169-175; “Taoist Tales, Part III,” *The New China Review* 2.3 (1920): 290-297; “Taoist Tales. A Rejoinder,” *The New China Review* 3.1 (1921): 65-68; “Kiukiang 九江,” *The New China Review* 3.5 (1921); “South-west Gate, Peking 北京西南大門,” *The New China Review* 4.4 (1922); “An Ting Men, Peking 北京安亭門,” *The New China Review* 4.5 (1922).

³⁷ Roger Fry, ed., *Chinese Art: An Introductory Review of Painting, Ceramics, Textiles, Bronzes, Sculpture, Jade, etc.* (London: B. T. Batsford, 1925). 葉慈所撰部分（*Early Chinese Bronzes*）另以抽印本的形式，由 Brill 印行流傳。

³⁸ 1935 年，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在倫敦籌辦之際，此專著被要求再次出版，葉慈因為沒有時間更新十年之間中國青銅器研究的變化，而沒有參與再版的專書。

門負責人芮克漢（Bernard Rackham, 1876-1864）等，由尤摩福波羅士擔任會長。學會每年發行會刊，促進相關收藏品的研究討論，由霍蒲森擔任主編。

不久，學會人士開始投入整理尤摩福波羅士的豐富收藏，由在大英博物館負責東方印刷及繪畫部門的比尼恩（Laurence Binyon, 1869-1943）整理書畫部分，負責陶瓷部門的霍蒲森整理陶瓷部分，另請葉慈專門整理青銅器收藏的部分，如此花了數年時間將成果陸續出版，最後集結成一大套鑑賞圖錄，成為國際收藏界的一大盛事。葉慈的青銅器部分，從 1929 到 1932 年間，共出版三大冊，出版後國際漢學界一致叫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³⁹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費雪（Otto Fischer, 1886-1948）等人都寫了書評。⁴⁰此研究成果可說是進一步奠定葉慈在英國漢學界的地位，尤其是被認定為中國青銅器的鑑賞專家。

1930 年，在富商兼收藏家大維德（Percival David, 1892-1964）贊助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即今日亞非學院之前身）創立歐洲首個中國美術及考古學教席，葉慈受邀擔任講師（lecturer）。⁴¹ 1933 年，分配部分英國所得庚子賠款的大學中國委員會（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決定資助科陶德藝術學院成立一個中國美術與考古學教席，葉慈又被延攬擔任教授，直到 1946 年退休。⁴²這也是當時英國高教機構中唯一與中國考古學有關的一個教席，這就是為何吳金鼎、曾昭燏、夏鼐等有志從事中國考古學、又想在英國拿學位的年輕學子當時會登記在葉慈名下的結構性因素。

在尤摩福波羅士收藏圖錄出版後，葉慈又受託整理兼具瑞典和英國背景的收藏家 Anders Eric Knös Cull（1878-1968）所收藏的中國銅器。在認識曾昭燏後，他十分希望倚重曾昭燏的長才，在得知她在碩士畢業後可能轉去德國，就開出每年津貼 200 英鎊，以兩年為期，且未來協助她取得博士學位的條件，希望她能留在倫敦做他的助手。⁴³但曾昭燏仍選擇先到德國實習，直到 1938 年 4 月才回到倫敦大學正式擔任助教工作，不過最後她還是決定回中國。儘管如此，葉慈在 1939 年出版 *The Cull Chinese Bronzes* 一書時，仍在序言感謝學生曾昭燏的協助，並且特別寄了一本到中國給她。⁴⁴此書中也參考胡小石的〈古文變遷論〉，應是曾昭燏的引介。

³⁹ Paul Pelliot, “Les bronzes de la collection Eumorfopoulos publiés par M. W. P. Yetts (I et II),” *T'oung Pao* 27.4/5 (1930): 359-406.

⁴⁰ Bernhard Karlgren,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and Corean Bronzes, Sculpture, Jades, Jewellery, and Miscellaneous Objects* by W. Perceval Yett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6.1 (1930): 241-252; Otto Fischer,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and Corean Bronzes, Sculpture, Jades, Jewellery and Miscellaneous Objects*. By W. Perceval Yetts,” *Artibus Asiae* 5.2/4 (1935): 314-315.

⁴¹ “Dr. Perceval Yetts. Noted authority on Chinese art,” *The Times*, 1957.05.15, p. 13.

⁴² O. M. Green, “Professor of Chinese Art. New appointment for Mr. Perceval Yett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33.04.19, p. 7.

⁴³ 見夏鼐，《夏鼐日記》卷二，頁 109。

⁴⁴ Perceval Yetts, *The Cull Chinese Bronzes* (London: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University of London, 1939), p. vi.

有關英國部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由大維德、尤摩福波羅士、霍蒲森、大英博物館館長希樂（George Francis Hill, 1867-1948）與英國海軍退休將軍馬勒孔（Neill Malcolm, 1869-1953）共同寫信至英國外交部，以尋求在倫敦舉辦中國藝術展覽的支持。此倡議後獲英國外交部與中國教育部同意，建立更大的組織委員會（organizing committee），成員除了上述幾位，還包含拉菲爾、葉慈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等。1935-1936年，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於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盛大舉行，吸引超過四十萬人參觀，英國民眾對於中國藝術有了廣泛接觸的機會。就是在收藏家群體、博物館、研究者出版等幾股力量交會下，英國在中國美術與考古方面的研究於1930年代一方面邁向學術專業化（葉慈就是這轉型期的指標性人物），另一方面，也透過大型展覽，達到普及化的效果。

當時在倫敦留學的曾昭燏、夏鼐等人都會去參觀過這個大型展覽。曾昭燏還以英文為《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寫了一篇展品介紹文。⁴⁵史語所的殷墟考古出土物也在選擇委員伯希和的建議下參展，使得李濟大名更加遠播。⁴⁶他因此受到英國十多個學術機構聯合邀請演講，如前所述，他也趁機在英國和歐洲各地考察博物館建設。（圖五）

簡而言之，曾昭燏在英國期間，等於是見證了中國美術考古在英國學術界走向專業化的初期，以及英國大眾對中國文物更多接觸的時刻。這似乎使她更想回到中國，參與第一線考古、博物館等工作，同時貢獻所學。葉慈等學者的成就在當時西方漢學界雖已不可小覷，但在自幼受到深厚古學訓練的曾昭燏、夏鼐等學生眼中，還是無法從葉慈處學習新的事物，這也是為何他們急於另尋新的學習方向。曾昭燏甚至在給傅斯年的信中直率表達，認為自己可以在葉慈處「馬馬虎虎騙張文憑」，省下時間學新東西。⁴⁷



圖五：曾昭燏文章，刊登於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935.11.23

⁴⁵ 該篇文章可能是受邀撰稿，作者名字只出現其姓氏，其他部分縮寫：Miss C. Y. Tsêng, “Her Majesty’s Gracious Loan to the Chinese Art Exhibitio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935.11.23.

⁴⁶ 戴麗娟，〈史語所成立初期與法國漢學界的互動：以蔡元培、傅斯年、伯希和為主線的初探〉，《古今論衡》44（2025）：3-34。

⁴⁷ 見注25，其1936年9月30日信件（附件二）。

1937年7月，曾昭燏果然順利獲得倫敦大學的碩士學位。她的學位論文〈中國古代銅器銘文與花紋〉，以她在中国和英國博物館收集的鬲、爵、鼎、壺、尊等各種器型在內的上千種商周銅器為研究對象，以圖文並茂的方式比較分析了銅器上的徽識、銘文、花紋的異同和特點。她的論文不僅吸收羅振玉、郭沫若、高本漢等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更發展了胡小石在〈古文變遷論〉一文中所倡導的「銅器上的銘文變遷與花紋相適應」的說法，對此做出更為細緻的觀察和分析，受到指導老師的讚許。⁴⁸

在這之後，她先與兩位畢業擬返華工作的表姊到巴黎各地一遊，之後在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定居柏林，固定到前面已提過的史前史和原史博物館聽課與實習。⁴⁹當時這個博物館是德國最主要的考古學博物館之一，收藏世界各地的考古文物。她主要是跟從館長 Wilhelm Unverzagt 教授（1892-1971）和負責研發保存文物技術的化學實驗室（Rathgen-Forschungslabor）之主任 Carl Brittner（1883-1958）學習，同時自行考察柏林數十個博物館。⁵⁰1938年2月，她轉往慕尼黑博物館實習，前後共停留兩個月，主要從事博物館藏品整理和策畫展覽的實習工作。回到柏林後，在1938年4月7日，請史前史和原史博物館館長 Wilhelm Unverzagt 教授開立實習證明，算是完成在德國的實習。⁵¹

曾昭燏當時人雖在歐洲，但十分關心中日戰爭情勢，日記中經常記載報章所讀或留學生之間對此的討論，以及她想要為國盡心力的想法。雖然其部分家人得知她可以在倫敦工作，都勸她留在國外，暫時不要回國，她還是在1938年9月毅然辭去職位，啟程返回中國。由於缺乏明確資料，無從得知此決定是否也與當時曾經答應李濟學成後要回國服務有關。無論如何，她在9月20日由英國啟程，先往柏林和朋友告別，後經巴黎，再從馬賽搭船經越南回到中國。她在10月29日到達昆明，11月4日即見到李濟等人。根據李濟寫給杭立武的一封信（日期1938年12月12日），可知曾昭燏之後不久即加入中博院籌備處工作。⁵²但她究竟是何時成為該機構正式的一員？根據一份曾昭燏自己在1944年中提供給教育部的簡歷，在1939年1月至6月間，她的身份是「受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委託參加雲南大理考古發掘」，之後在該年7月才成為正式職員。⁵³當時其職稱是「專門設計委員」，亦簡稱「專員」。⁵⁴（圖六）

⁴⁸ 該論文收入南京博物院編，《曾昭燏文集》，頁52-182。

⁴⁹ 見頁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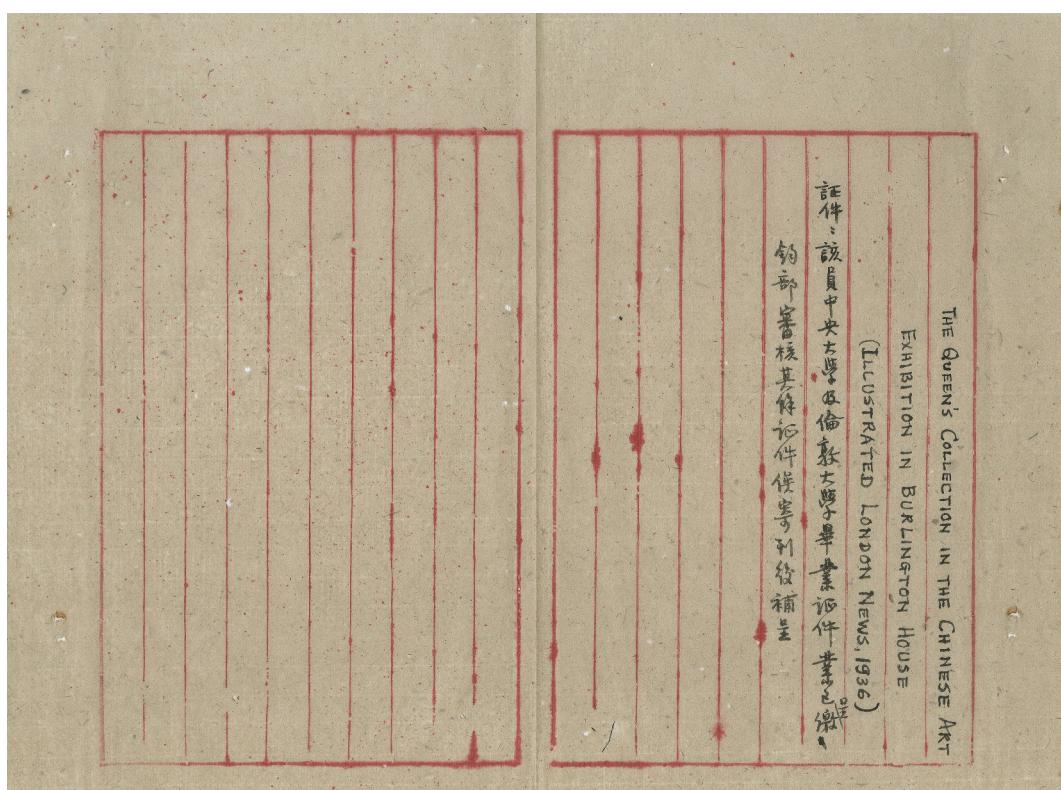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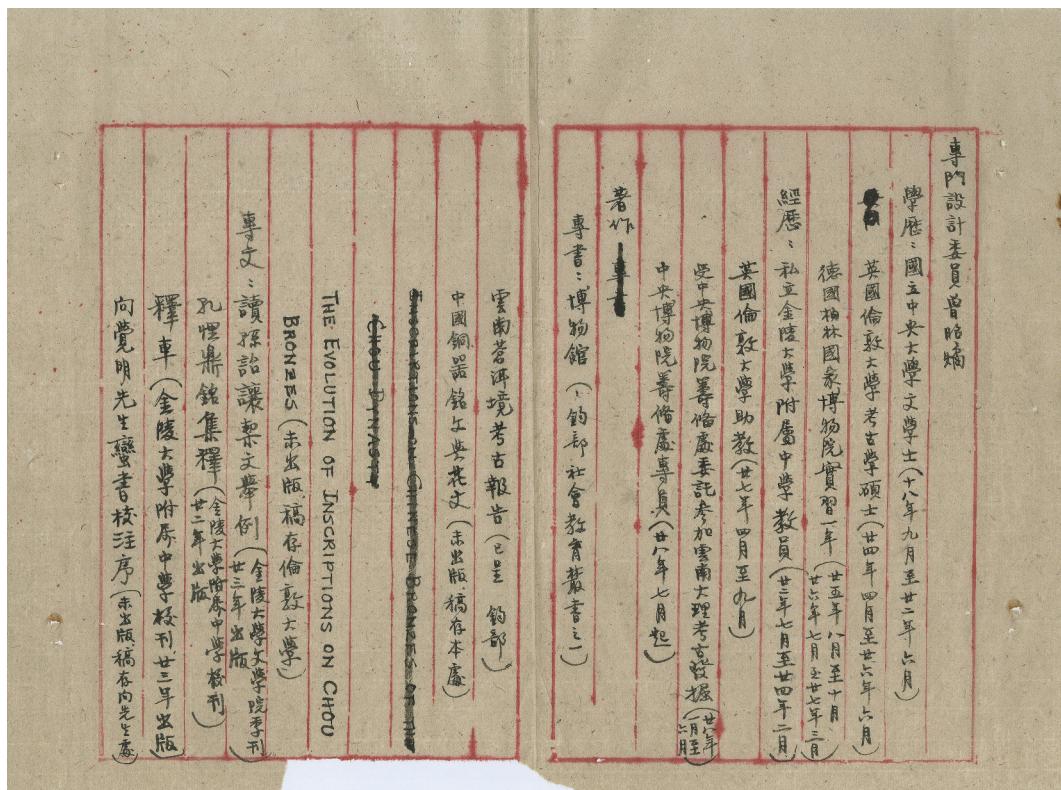
⁵⁰ 當時 Wilhelm Unverzagt 教授也在柏林大學教授考古學，曾昭燏就是上他的課程。

⁵¹ 根據其日記所載日期。這份實習證明書就是後來用於其紀念文集的影像（見南京博物院編，《曾昭燏文集》，圖片頁2）。文集中另附有曾氏和兩位男士的合影，但對於這兩位男士的身份辨別有誤。

⁵² 由於中博院籌備處的部分經費來源是中英庚款委員會固定撥給的經費，而杭立武是該委員會事務所總幹事，故李濟向杭立武說明經費使用規劃。見史語所檔案：考19-1-37。

⁵³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數位檔號 A335000000E/0033/600/007/001/012/0006。中博院籌備處其他相關檔案也可證實她是在1939年7月到職。國立中央博物院編，《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概況》（1942），頁81。

⁵⁴ 有關職稱部分，另可參國立中央博物院編，《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概況》，頁81。



圖六：曾昭燏在 1944 年提供給教育部的簡歷兩頁

(上：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A335000000E/0033/600/007/001/012/0006)

(下：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A335000000E/0033/600/007/001/012/0007)

四、在中博院籌備處工作

中華民國成立後不久，北京政府教育部就在北平國子監設立歷史博物館。由於經費不足、政局不穩，歷史博物館一直處於籌備階段，十餘年後 1926 年才正式對外公開展覽。不過在 1928 年北伐成功後，歷史博物館就隸屬於古物保管委員會管理，1929 年春，又改屬教育部，同年 8 月，又轉交中央研究院接收。

在蔡元培等人的鼓吹及英國庚款的支持下，教育部委託中研院史語所成立「國立中央博物院」，1933 年 6 月先設立籌備處。這個機構的設立，顯現中央政府規劃成立國家級博物館的決心。1936 年 7 月，原屬歷史博物館的藏品就合併至中博院籌備處。⁵⁵ 所以此機構雖較晚設立，但一開始就陸續接收不少藏品。⁵⁶

依照最初藍圖，中博院將建立人文、工藝、自然三大館，在組織上也於院長之下，設立三館館長，但一開始因經費有限，決定先以人文館開始建造，並以競圖方式對外徵求建築設計。1936 年動工興建，原本規劃在館舍落成後可脫離籌備階段，宣布正式成立，但因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一年後日軍占領南京，當時第一期工程僅完成一半就被迫暫停。中博院籌備處此時跟隨史語所等機構開始西遷，先至重慶，後移入昆明，最後落腳四川李莊（1940 年 10 月衆人開始陸續從昆明搬遷）。之所以選擇李莊，是因為該地偏僻，在地圖上無法辨識，可以避免日軍空襲。

中博院籌備處自成立後，除了從不同單位陸續接收古物藏品，也規劃自行發掘和採集，因此派員到不同地區調查。曾昭燏在中國參與的第一個發掘計畫，便是由吳金鼎規劃和主持的雲南大理計畫。於 1937 年在英國倫敦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吳金鼎此時亦是中博院籌備處專員，他在 1938 年 11 月先至當地勘查，擬定發掘計畫，經過李濟同意後，由吳金鼎、王介忱夫婦與曾昭燏組成的工作團隊在 1939 年 1 月出發開始工作，一直進行到 1940 年 6 月結束。他們在雲南大理點蒼山、洱海境內進行考古調查，發現考古遺址和古蹟共 38 處，古墓葬 17 座。考古報告草稿由三人合作撰寫，正式的《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則由曾昭燏整理抄寫完畢，1942 年付梓，但因為印刷公司拖延，於 1944 年才出版，成為中博院專刊乙種第一本。⁵⁷ 這份考古報告日後成為大理古代文化史研究者常引用的資料。這次田野考古由於有王介忱、曾昭燏兩位女性的參與，一般被視為是中國女性考古學的先聲。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地雇用來幫忙的工人也多是白族婦女，反映了該族群既有的性別社會分工。

⁵⁵ 有關此機構早期情況，見譚旦冏，《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經過》（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0）。

⁵⁶ 除了原歷史博物館的藏品，初期還購置繪圖、善齋、頌齋等私人出售藏品，並規劃未來接收古物陳列所物品。

⁵⁷ 吳金鼎、曾昭燏、王介忱，《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四川南溪：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1942）。

回到昆明後不久，1940 年 10 月開始，衆人分批隨機構往李莊遷移。在此同時，吳金鼎繼續規劃西南考古調查，1941 年 1 月底，他轉至史語所任職。中博院籌備處第二次考古計畫即是往四川彭山江口一帶調查崖墓，由該機構、史語所、營造學社的人員組成川康古蹟考察團，依照專長分工進行。考察團從 1941 年 6 月中開始工作，最後在 1942 年 12 月中結束，曾昭燏與吳金鼎、王介忱首批一起出發，其他人陸續加入。⁵⁸但 1942 年 2 月初，因李濟打電報要她回李莊協助，她因此先結束此次與團隊的田野工作，其他成員則斷斷續續工作到該年年底才結束回李莊。⁵⁹在此之後直到 1949 年，她也因編目和行政等室內工作而沒有機會再進行其他田野考古。此次彭山發掘以漢墓為主，成果亦是相當豐碩，但是因為當時各種條件緊張，考古報告沒有正式出版。直到 1980 年代，才由當年也參加工作的趙青芳（1981 年 2 月被任命為南京博物院副院長）帶領團隊重新整理，並於 1991 年由南京博物院編輯發表。⁶⁰倒是曾昭燏在 1946 年因整理工作之便，曾經就此次發掘成果之部分，寫成〈從彭山陶俑中所見漢代服飾〉一文。⁶¹

1940 年下半年，隨著太平洋戰事升溫，中博院籌備處挑選珍品，分批運往四川南溪的李莊。當時的主任幹事為郭寶鈞，但大約在 1942 年 3 月，曾昭燏開始長期駐守李莊，主要工作是藏品整理、保存和登錄工作，在郭寶鈞或李濟不在時，有時也代理主任幹事或主任的職務，幾乎統管中博院籌備處的一切事物。⁶²尤其是李濟不在處內辦公期間，她有時必須協助打點一切，還必須經常寫信向李濟報告各種事項。⁶³當李濟與傅斯年兩人為兩機構財務和人事發生爭執時，她經常必須穿梭其間，調停兩端。（圖七）

1943 至 1945 年間，她個人最主要的工作當屬帶領小團隊進行藏品登記和保存工作。根據譚旦岡一書，這項工作，在 1943 年是由曾昭燏、游戒微（即游壽）兩人共同負責，⁶⁴當時已就頌齋銅器、善齋銅器一部分，將其形制、大小、裝飾、好壞情形一一詳加記錄，而且每件除畫簡圖於卡片上，並另製詳圖，及花紋文字之拓片，以供

⁵⁸ 譚旦岡一書中根據當時的工作報告，載明此三人是在 4 月 22 日抵達彭山。見譚旦岡，《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經過》，頁 125。該考察隊其他成員是後來陸續到達。例如營造學社的陳明達為 5 月底、該年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的夏鼐約 7 月加入，史語所高去尋則在 10 月初到達等。見譚旦岡，《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經過》，頁 126。

⁵⁹ 見譚旦岡，《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經過》，頁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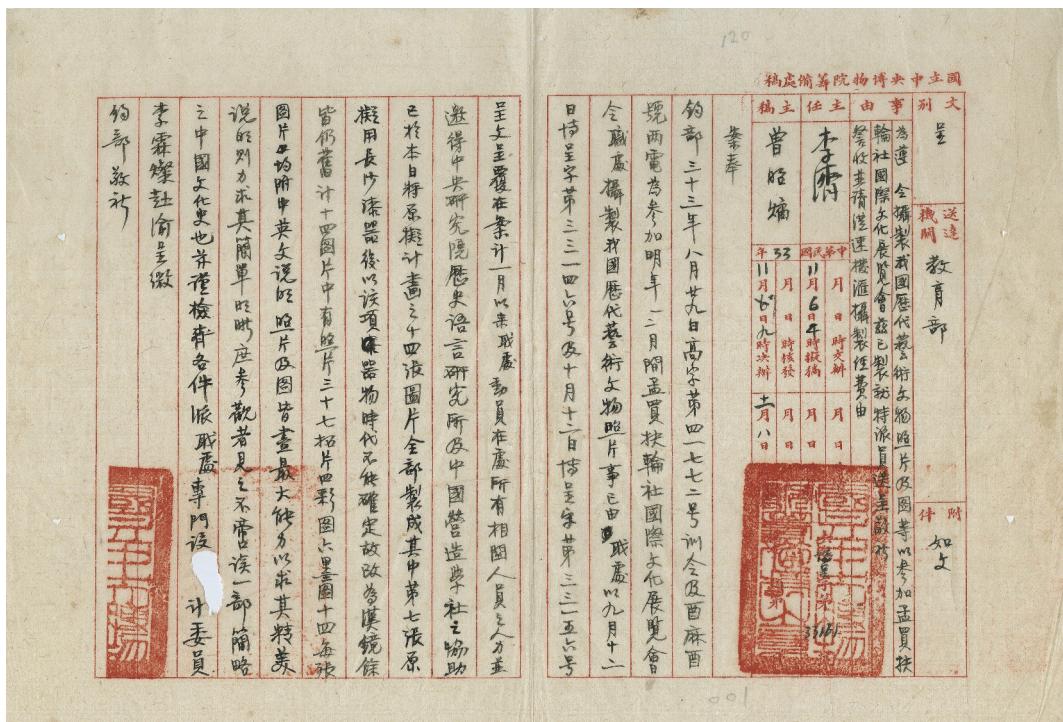
⁶⁰ 南京博物院編，《四川彭山漢代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⁶¹ 收入南京博物院編，《曾昭燏文集》，頁 206-231。

⁶² 根據南京博物院出版品所載，曾昭燏在 1941 年 2 月被任命為代理總幹事，但當時她還在彭山與團隊一起進行田野調查，故此日期應有誤。依現有零星資料（曾之殘留日記未包含 1940-1950 年這段），應該是在 1942 年 3 月回到李莊後才開始斷斷續續兼任此職。從目前檔案管理局所保存的中博院籌備處資料，也可看到許多由她代為執筆的公函往來文件。

⁶³ 李濟因公偶爾需要前往重慶、成都，在李莊期間，有時也在史語所所在的板栗坳工作，而不在中博院籌備處所在的張家祠堂，因此雙方經常需要通信。一部分她在此期間寫給李濟的信已出版，見南京博物院編，《曾昭燏紀念》，頁 138-198。

⁶⁴ 有關游壽在中博院籌備處、史語所的經歷，請參考本專號鄭雅如博士的〈游壽入史語所的契機、身分定位與工作成果——兼談新見〈冢墓遺文史事叢考序目〉〉。



圖七：曾昭燏代擬公函一例（1944年11月6日）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A335000000E/0033/120/001/001/008/0001)

研究使用。再加上其他新舊藏的登記，光是該年上半年就完成五百餘張登記卡片。後來游戒微因故離開，接下來兩年，曾昭燏招考、培訓新人，持續整理和登錄的工作。1944年完成3800餘件登錄工作，1945年完成2500餘件，前後大概完成7000張卡片。⁶⁵這些藏品編目工作都是博物館的基礎工作，要做得好卻也極費心力，一般在論述曾昭燏作品時，並不會將這些列入討論，然而在回顧其對中博院貢獻時，這應該是不容忽視的一部分。尤其她在工作過程中，對於年輕新近人員如高仁俊、索予明等人的訓練，是這些老中博人到晚年回憶時還津津樂道、心存感激的部分。⁶⁶

在田野、編目和行政工作外，曾昭燏在李莊期間也協助辦理各式展覽。在教育部要求下，1943年11月配合參與社教擴大運動和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日，中博院籌備處在重慶舉辦展覽，以石器類（由李濟、曾昭燏負責設計）和銅器類（由郭寶鈞負責設計）為主，分兩部陳列，共展出一千多件展品，雖僅兩週左右，但吸引約十萬人參觀，也受到學術界重視。⁶⁷1944年，中博院籌備處在李莊共舉行四次展覽會，分別是貴州夷苗衣飾展覽、漢代十三種車制展覽、中國歷代建築圖像展覽、雲南麗江麼些

⁶⁵ 譚旦同，《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經過》，頁196-198。此書附圖有一份當時的藏品登錄卡影像。

⁶⁶ 可參考例如：索予明口述，馮明珠代筆，〈烽火漫天拚學術——記李莊時期的中央博物院〉，《故宮文物月刊》275（2006）：96-105；高仁俊，〈憶前中央博物院的幕後功臣——曾昭燏女士〉，《故宮文物月刊》281（2006）：102-107。

⁶⁷ 譚旦同，《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經過》，頁201-203。在此之前，此展覽曾於李莊進行一天的預展，吸引八千人參觀。

族文化展覽。1945年3月末還舉辦一次中國歷代銅鏡展覽。⁶⁸從其當時與李濟的往來書信中，可看出曾昭燏皆參與其中，也幫忙寫工作報告，還因應外界要求，寫展覽宣傳文。例如在袁同禮（1895-1965）的邀約下，曾昭燏為這些展覽寫了數篇介紹文刊登在《圖書季刊》，但都沒有署名。⁶⁹

戰後除了復員工作，自1946年開始，曾昭燏最主要的工作是督促博物院主建築的完成。因李濟被派出國及因父病重而滯留重慶時，她代表中博院參加「戰時文物損失清理委員會」、「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敵偽文物統一分配委員會」等工作。⁷⁰1947年，李濟辭去中博院籌備處主任一職，遺缺由杭立武兼任，曾昭燏仍任專門委員、兼主任幹事。1948年，當初由徐敬直設計、戰前只完成一半的中博院「人文館」才真正竣工開放。⁷¹原本規劃除了「人文館」，還有「工藝館」、「自然館」兩館之建築物，因國共爆發全面內戰未能進行。

在主建築正式落成後，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博院與故宮博物院在其中舉辦盛大的聯合展覽，共有八個展覽室，吸引數萬人參觀。政界名人如蔣介石、于右任等皆到場參觀。⁷²從當時照片來看，曾昭燏也在為貴賓導覽之列。然而就在這次盛大展覽後不久，1948年底徐蚌會戰後，局勢十分危急，兩院相關負責人決定配合政府決定，將精選文物遷往臺灣安放。原本合作關係密切的團隊成員至此分成遷臺派和留陸派兩派。當時傅斯年力勸曾昭燏與史語所一起遷到臺灣，⁷³曾家自己的手足也有幾位此時選擇到臺灣，但因受到左傾的二哥和二嫂影響，曾昭燏選擇留陸，後來還和徐鴻寶（1881-1971）等人一起公開反對將文物遷臺。過去緊密合作的團隊伙伴，從此走向不同的運途。⁷⁴

五、博物館專論書籍的出現以及曾昭燏著作的特殊性

1930年代中期，隨著博物館數量增多，又有國家級的中博院籌備處成立，加上

⁶⁸ 譚旦同，《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經過》，頁203。

⁶⁹ 見〈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三十二年度專題展覽計劃〉，《社會教育季刊》（重慶）1.2（1943）：93-95、〈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第一次專題展覽會記事〉，《圖書季刊》新4.3/4（1943）：130-131、〈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之各種展覽〉，《圖書季刊》新5.2/3（1944）：109、〈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之麼些文物展覽〉，《圖書季刊》新5.4（1944）：110。

⁷⁰ 曹清、張蔚星編撰，《曾昭燏年譜（徵求意見稿）》，頁141。

⁷¹ 也就是現今南京博物院的大殿，仿遼代風格而成。

⁷² 譚旦同，《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經過》，頁245。

⁷³ 曹清、張蔚星編撰，《曾昭燏年譜（徵求意見稿）》，頁141。

⁷⁴ 對國民黨失望的曾昭掄將希望投射在中國共產黨，他在1948年初曾寫信給曾昭燏，希望她與俞大綱到解放區去服務，見曹清、張蔚星編撰，《曾昭燏年譜（徵求意見稿）》，頁144。另根據曾昭燏自己在1951年撰寫的自白，在1947年8月至1948年11月期間，她與暫到南京居住的俞大綱有許多往來和討論，俞大綱的政治意見和其夫婿曾昭掄是一致的。見曹清、張蔚星編撰，《曾昭燏年譜（徵求意見稿）》，頁143。

欲與國際博物館組織接軌，一些相關學者遂有成立專門協會的想法。1934年，北平圖書館館長兼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1881-1955）、中博院籌備處主任傅斯年等人開始籌議「中國博物館協會」事宜，得到多人的支持。當時發起創設「中國博物館協會」的人員多為各界著名人士，涵括了當時各學界如歷史學、文字學、金石學、考古學、文物鑑賞、書畫、美學、生物學、化學、建築學等領域的精英和專家學者，共68人。按照其組織大綱，中國博物館協會之宗旨為「研究博物館學術、發展博物館事業、並謀博物館之互助」。⁷⁵

1935年5月，這個協會正式成立，同年9月開始發行會報，刊登各類翻譯或初步研究成果。當時也發起全國性調查，將調查結果出版成《中國博物館一覽》一書，於1936年5月出版。至此，博物館學在中國開始發展，有專門期刊，也開始有博物館學專著出現。若我們比較1949年以前出版的第一批博物館學專著，可發現曾昭燏著作的特殊性。

以目前所知，在1949年以前出版的博物館學專著有以下幾份：

1. 費畊雨、費鴻年編著，《博物館學概論》，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6月（216頁）
2. 陳端志，《博物館學通論》，上海：上海市博物館，1936年7月（270頁）
3. 陳端志，《博物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6月（62頁）
4. 荊三林，《博物館學大綱》，中國文化服務社陝西分社，1941年9月（102頁）
5. 曾昭燏，《博物館》，重慶：正中書局，1943年（84頁，1947年再版）
6. 費畊雨、費鴻年編著，《博物館學概論》，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177頁）

上列的第三和第六份，其實是第一和第二份的精簡版，所以整體來說，只有四份專著。其中第一份《博物館學概論》和第二份《博物館學通論》，其實都是參考日人棚橋源太郎《眼に訴へる教育機關》（訴諸於眼的教育機關）一書，再進行翻譯改編。⁷⁶費畊雨的書中前言也明確說明是參考棚橋的書。

若再仔細分析其內容，費畊雨和費鴻年的《博物館學概論》一書總共13章，與棚橋源太郎《眼に訴へる教育機關》一書相似的章節即有12章，可說兩者內容相似度有90%以上。⁷⁷

⁷⁵ 〈組織大綱〉，《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1.1（1935）：2-4。

⁷⁶ 博物館協會會報的報導也是如此陳述。

⁷⁷ 費畊雨和費鴻年書中相似於棚橋書的章節包括：第二章博物館發達史略、第三章博物館的種類及效能（棚橋書為「職能」）、第四章地方博物館、第五章教育博物館、第六章學校博物館、第七章兒童博物館、第八章室外博物館（棚橋書為「戶外」）、第九章動植物園與水族館、第十章物品的收集與保存（棚橋書章名為「物品的蒐集製作整理保存」）、第十一章博物館的陳列、第十二章博物館的社會事業（此章融合了棚橋書的三章內容：博物館的學校教育、研究機關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宣傳）、第十三章博物館的建築。

陳端志《博物館學通論》一書在總共 18 章中，與棚橋源太郎《眼に訴へる教育機關》一書相似的章節有 10 章以上，可說兩者相似度有 60% 以上。

至於荊三林的《博物館學大綱》，出版於陝西，主要是當時教育部打算在各省設立民衆教育館和科學館，荊三林認為有為當地出版一份博物館參考著作的必要，因此彙整過去所收集的資料而成。除了參考陳端志的書之外，主要從過去博物館協會會報的相關文章編輯而成，另加兩篇較長的附錄，一篇是傅振倫所寫，有關大英博物館參觀紀錄。一篇是劉衍淮所寫的〈德國自然科學及工藝博物館遊記〉，也是原本刊登於中國博物館協會刊物的文章。所以整體而言，此書性質比較像是一份編著，不完全是作者自己寫成。

曾昭燏的《博物館》一書，則是以她過去在歐洲實習觀察，加上參考當時英文的博物館著作寫成。全書篇幅不大，但一氣呵成，完全沒有日人作品的影子，和前述三書極不相同。此外，曾昭燏著作在理論部分較少，但在博物館保存、策展等方面的實務工作說明較詳細，可以直接當作博物館人員入門工作手冊使用。這點也得到當時在中博院工作的年輕同仁肯定，覺得閱讀此書十分受用。另外，因應戰爭時期的需求，她也花了一些篇幅特別提到戰時博物館可以做的工作，這也是前面幾份專著所沒有的。

根據其個人日記，可得知她大概是在 1940 年 7 月間就開始編寫此書，而且知道此書是特為教育部撰寫。她在 8 月 24 日將初稿交給李濟，9 月 6 日曾經再次抄寫此書。9 月 25-26 日重新贊錄，並做五圖交卷。⁷⁸但不知何故，此書遲至 1943 年才出版。出版時，則與李濟一起掛名。此書當時是在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主編出版的社會教育輔導叢書系列，封面書名「博物館」三個字由當時教育部長陳立夫親自題字。雖有李濟掛名，但是內容大概都是出自曾氏之筆。後人整理李濟的出版目錄上，也沒有列入這條出版資料，可見李濟可能是純粹掛名。

至於為何李濟會掛名，根據李濟之子李光謨的推測，可能怕曾昭燏當時名氣不夠，所以掛上李濟之名，增加此書的知名度。⁷⁹也有可能是此書的出版機會是透過李濟而來，故當時也掛上李濟之名。無論如何，後世提到此書時，多是以曾昭燏為主要作者。⁸⁰此書也標誌了博物館通論的轉變，在此之後，中國此專題的著作多參考歐美著作，較少再引用日文專書。

⁷⁸ 曹清、張蔚星編撰，《曾昭燏年譜（徵求意見稿）》，頁 123。

⁷⁹ 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⁸⁰ 在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一份，是由曾昭燏送給傅斯年的，上有其親筆簽名。

六、代結語

1949年，中博院籌備處與原北平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等文物一起遷到臺灣，最後在1965年併入新建成、位於臺北外雙溪之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博院籌備處至此正式結束。其在南京原址的部分，則於1950年3月改名為南京博物院。此時曾昭燏擔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兼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並主持發掘南唐二陵。1955年，她升任為該院院長，成為第一位女院長，直到她1964年底自殺為止。

儘管擔任院長，但由於她的出身，1957年反右運動中，她與二哥、二嫂、姪子等人都被打為右派，一度曾任教育部次長的二哥此時失去北大教職，最後在武漢大學落腳、姪子被迫下鄉勞改，她也經常需要自我檢討和交代。1962年3月，一向支持她的胡小石老師亦過世，種種變化使她陷入憂鬱狀態。1964年3月，她因憂鬱症入院治療，同年12月，她選擇在南京郊外靈谷寺縱身而下，當場死亡。身後被葬在南唐二陵，是她曾經主持考古的地點。在她辭世後，她的二嫂在文革中不堪凌辱、服毒自殺，沒多久二哥在武漢也因癌症過世，連姪子也在1966年因文革批鬥而亡，一家轉眼皆凋零。

綜合來看，曾昭燏出身名門大族，本家及姻親家族栽培子女不分性別，所以好幾位女性成員都受高等教育，甚至出國留學，而能在不同的專業領域發展到一定程度。在專業科目的選擇上，她憑著自己的興趣，從古典詩詞、古文字研究、器物研究、田野考古，到博物館研究，皆有涉獵。最後以考古和博物館學為專業的發展領域。這兩個領域在當時都是相對新興的學問領域，她十分有自覺要對所學領域的未來發展有所貢獻，希望能夠突破。這在她給傅斯年的信中明顯看出。另一方面，她對國家民族的認同也特別強烈，在留學期間為當時陷入戰爭的中國憂心，流露出女性知識分子對國家的責任感。後來她公開出面反對文物遷臺，也是基於同樣的想法。

晚近在進行婦女史研究時，傾向以性別、種族、階級等取徑交叉討論。若以曾昭燏這樣的女性學者來看，她因出身名門大族，家中注重教育，似乎沒有因性別而受到太多職業生涯的發展限制，出國求學期間也沒有因種族而受到歧視，但最終在新中國成立後，因階級問題而被劃為右派，她也因此罹患憂鬱症而自殺，終究未能在其專業領域做長期貢獻，讓曾經見識其才華的同代人留下深深遺憾。

附件一：曾昭燏致傅斯年函（1936年6月19日）

傅先生：

原諒我第一次寫信給您，就麻煩您看這樣長的信，還要麻煩您請您答覆。

前兩個星期，夏鼐給您寫與他的信給我看，您和他討論他求學的問題，並要他轉告我，我很感謝您的好意，所以今日冒昧的寫信和您商量。

本來呢，我們在此地（Courtauld Institute）讀書，可學的甚少，正如您信上所說的「外國漢學家每好收羅中國學生炫人」。我是去年春天來的，因為那時吳金鼎已回中國去，找不到人商量，經人介紹，糊裏糊塗的就進了學校，上了一學期課，當然就感覺了。所以夏鼐來的時候，先來找我，我就很坦白的告訴他，要他到 University College 去，但他也為環境包圍，而到了此地，其中詳情，他已經寫信告訴您的。他在此地，當然不滿意，所以要轉學。我呢，本來去年暑假就可以轉的，因我一念的「難為情」，同時時間太匆促，不容我有考慮和商量的餘地，所以沒有轉。

當然在此地也有相當的好處，第一是倫敦大學各學院的課程很多，我們可以自由的去聽講做實習，例如這一年來，我和夏鼐、吳金鼎三人都在其他學院上課，夏鼐上的尤其多；第二論文可以馬虎一點，而騰出較多的時間來學習其他的課程，不過根本而論，我們到外國來，應當學外國的東西，中國考古是無從學。

您信上說「中國考古學之發達，須有下列專科之研習者：

70

1. Prehistory
2. Egyptology
3. Assyriology including Ancient Asia Minor
4. Classical Archaeology
5. Byzantine and Arabic Arch.
6. Indian Arch.
7. Oceanic Arch.
8. American Arch.

但是，在英國對於考古並不十分完全，例如⑤、⑦、⑧是完全沒有，關於「史前」的考古，愛丁堡是很有名，但因地方小，錢太少，設備不十分充足；劍橋似乎也有一點，但我們不十分清楚。您信上說「中國學史前的已有數人」，勸夏鼐不必到愛丁堡去，所以我們也用不著討論。關於 Classical 的，倫敦大學和牛津都有，但多注重於藝術，尤其是雕刻，似乎和我們無大關係。「印度考古」，倫敦大學也有少數的課程，但十分的不完全，倫敦大學考古部份最好的要算「埃及學」，其次便是「近東的考古」，

包括米索波大米、伊蘭等。夏鼐大約決計學埃及學，我本來也想學埃及的，已和教「埃及學」的教授接洽過，他表示歡迎，但夏鼐既學此，我不想學了，因為用不著兩人同學一種。夏鼐勸我學「近東」的一種，巴比倫或伊蘭，並勸我放棄一切科學的課程，如「測量」、「製圖」、「地質」、「人類學」等，而專從事於「文字」和「歷史」的研求，將來以近東的一種文字和文化發展的歷史與中國的相比較，也是很有用處。我自己想也是這個方法最好，因為我在中國的時候，比較於文字和歷史用功多，而於科學用功少。但我許多的朋友反對，說既然有時候，何不多學點歐洲的文字，何必學這種「死語」幹什麼，愷姐也是反對的一個。愷姐說「與其學埃及、巴比倫的東西，不如學點梵文」，但我知道學梵文的，中國已經有了，陳六哥和許地山就是有名的。您對於此事覺得如何？

我還有私人的問題，我在國外讀書，以前是家裏供給，現在是老文供給，但老文收入有限，最多能供給我一年，所以我在英國，只有一年了。您給夏鼐的信說「不必學有所成，即學到半途而返，猶有用處」，假使我把這一年的工夫，專學近東的一種文字和歷史，您覺得有用沒有？

您信上又說「夏鼐與吳金鼎從葉茲讀書，無非備其顧問」，當然呢，我也是顧問之一，但我在此地讀書，或者可以藉葉茲的力量，得到一筆獎學金，可以延長一年或兩年。此事雖不必，但有五分可能，本來是互相利用的性質，他利用我的學識，我利用他的金錢，也無所不可。我假使得了獎學金，便勢不得不離開此地，而勢不得不應酬式的寫篇論文，但寫個關於中國東西的論文，不到半年就完了，橫豎是騙人的，他們也不懂，而我可以利用其餘的時間，來學其餘的東西，您以為如何？

現在我總結的問您幾個問題：

- (一) 假使我不能得獎學金，那我在英國只有一年的時間，我應當學什麼？還是學點科學的方法？還是學一種文字和歷史？不讀學位，在中國有沒有關係？
- (二) 假使我能得獎學金，則在英國尚有二年或三年的時間，除寫一篇論文外，其餘的時間，應當向那一方面研求？

我沒有寫信和老文商量，也沒有和家裏其餘的人商量，因為他們於中國考古界情形完全不懂，於外國考古學尤其不懂。冒昧的寫信麻煩您，希望您為我個人著想，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著想，我學什麼東西，最有用處，趕快回信給我，因為我在暑期中必須決定下期的計畫。您既然不憚煩的指教夏鼐，希望您也能不憚煩的指教我。您知道老文很深，一定能相信我一切的話都是真的。最後請您看完此信，即刻撕掉，不要給別人看。敬請近安，並問

懷姐的好。回信請寄 c/o Mrs. Tsêng, 9 Tackley Place, Oxford

曾昭燏謹上 六月十九日

附件二：曾昭燏致傅斯年函（1936年9月30日）

傅先生：

前次承賜書，對於我求學的事，詳細的指導，非常感激。昨日又從倫敦轉來手札，荷費心查太平廣記所引啟顏錄各條，尤為感謝之至。啟顏錄卷子，既有抄下之價值，回倫敦後，當設法將全卷錄出。

我求學的計畫，自己曾仔細的考慮，並與愷姐和許多朋友商量，她們都認為學近東考古是最不智的事。①一年的時間太短，不能學有所成，②即使學得有相當程度，而回國去後，材料既少，學此道者又無人，結果弄成獨學無友，孤陋寡聞。我自己也以為然，尤其時間是最大的問題。

您所說以「博物院學」為研究之目的，我想是最好的方法：一則中國於此道尚不太發達，專學此者似尚無人，二則於我自己也較為方便；所以我決定向此方面進行，現在即在柏林兩個博物院做「古物保存」的實驗。關於古物保存的方法，倫敦大學曾開了一期的課程，但講堂上的演講，是毫無用處的，非得自己親身到實驗室不可。

我於八月一日從倫敦到了德國北部 Schleswig 城，在此城附近的 Viking 故城，參加他們的發掘六星期。因為我覺得自己將來即使不做田野工作，而真正學考古，非有田野工作的知識不可，尤其觀察和判斷，全靠田野中的經驗。而且德國是一個戰後新興的國家，窮困的情形，和中國也差不遠，而他們一切科學蒸蒸日上。他們能利用少數的錢，做多數的事業，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德國發掘的方法，和英國也差不多，但也有不同的地方。我在德國北部住了六個星期後，九月十一日到了柏林，因為北部發掘機關的指導作函介紹與柏林兩個博物院的保管者，他們允許我在這兩個博物院作實驗。一個是 Staatliches Museum für Vor- und Frühgeschichte，一個是 Laboratorium der Staatl. Museum。「歷史博物院」所學的東西很簡單，只有修補陶器的方法。「國立博物院實驗部」則比較複雜，大半以化學的方法，保存各種古物。他們大學中本無這科課程，所以我們來實習，既無課本，也無正式的實驗；惟一的辦法，只有和他們的工人一同工作，同時看點參考書。最好的就是兩個博物院的教授都很熱心，不懂的隨時可以問，所以每種方法都學得很徹底，但是進行得很慢。例如我來此已兩星期餘了，還只學得陶器和鐵器二種，我想在十月一個月把幾種重要的方法學了，十月底回到倫敦去，在大英博物院繼續這種工作，同時在 Yetts 處，馬虎驕張文憑罷了。

博物院這種學問，總算很實際了，但是能否適用，當然還是問題。第一各種古物出土土地之不同，例如他們的古物，大半來自埃及巴比倫，二地均近海，古物含有大量的鹽質，若在中國北部黃土帶中發掘出的東西，恐怕根本不同。第二這種學問，還是太貴族化了。德國這個「實驗部」就專為博物館而設立的，教授還口口聲聲說，他們太窮了，沒有錢買好東西，只得因陋就簡的勉強夠用就罷了。其實他們為了幾塊破鐵，已費了無窮的蒸餾水，這在我們窮的中國看來，已經是太消費了。所以我們學了這些東西回來，即使在博物院做事，一定還有無數的困難，但也不能因困難之故而不學。我最希望的，還是在博物院做事。聽說南京在朝天宮有大規模的博物院設立，不知此事屬實否？如是實，您能否為我留心？同時我希望知道中國博物院最所須要的是那一種學問，最感覺困難的是什麼，例如古物不能持久等々，我想在英德兩國做研究，都可以有相當的效果。

李濟之先生今冬來英國，我當與他詳談。如果您有時候回我的信，請仍寄牛津恒姐處。最後我感謝您一切的幫忙。敬請

近安

懷姐均此

曾昭燏謹上 九月三十日

附件三：曾昭燏致傅斯年函（1937年2月8日）

傅先生：

得榆妹信，承

示知說郭引啟顏錄事，感謝之至。李先生來英講學，我已和他詳談數次，我想到德國去學兩年博物院學，一則德國生活程度稍低，二則德國博物院陳列等々，均比英國為好。李先生大為贊成，並允許幫忙請湖南省政府獎金。李先生已將此事寫信給您，想您已收到了。湖南省政府獎金，我去年曾請過一次，但因為現在政府能獎勵的，是理工等科，所以沒有請得。不過長沙的人來信，說如學術界要人能有一函致何主席，仍有法可設。茲將長沙來信附呈一閱，您能否替我寫封信給何主席，同時託朱經農從中幫忙，同時我再請老文託何浩若，大約可有希望。我不願今年就回來，因為所學的實不夠用，即算您能設法替我找得一事，而我不能勝任，自己也覺得慚愧。我想假使能在德國專學兩年，總可以有相當的成績。英國一方面 Yetts 曾表示願意替我弄 Assistantship，我也和李先生商量過，我們都覺得用了人家的錢，勢必非將大部份的時間給人家不可，結果恐怕自己所學無幾，並且他能弄得到與否，尚是問題，所以我也沒有表示拒絕，也沒有表示必定接受。我想能在中國得獎學金，還是在中國得的好，因為比較可以自由。並且我感覺在英國學博物院學，遠不及德國的好。我从去年冬天起到現在，在大英博物院做點實驗，覺得很失望。我今年五月此地的工作就完了，完了之後，我想不管怎樣，即刻到德國去，如湖南省政府獎學金有希望，即在德國留下來，如沒有希望，那時再在英國設法，您以為何如？專此敬請

近安

曾昭燏謹上 二月八日